



一九八五年七月，顾廷龙在合众图书馆门前留影

合众图书馆（以下简称“合众”）是私人创办的、以向读者提供中国古典文献为业务范围的专业性图书馆。它又是文史哲诸方面专家学者研讨著述和一些年青的向学之士潜心习业的良好场所。

“合众”成立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当时正是日寇疯狂侵略我国、沿海各省相继沦陷、东南地区文物图书大量散亡的时候，而“上海租界区”正处于所谓“孤岛”时期。一些文化学术界知名之士，如张元济（菊生）、叶景葵（揆初）、陈陶遗、陈叔通、李拔可先生等，出于爱祖国民族文化的热忱，奔走呼吁，以创办图书馆来保存这些濒临毁灭的文献典籍。他们冒着种种危险，抢救图书报刊，筹募基金，建筑馆舍，遴选管理人员，使图书馆从成立时的粗具规模，发展到以后的颇为

完备，其工作的艰苦程度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

解放以后，上海市的文化设施蓬勃发展，为顺应社会的需要，于一九五三年六月，董事会决议将图书馆捐献给市人民政府，从此它以专业馆参加全市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图书馆网，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回顾从创办到捐献十有四年的经过，诸位先生的贡献都是巨大的。其中张先生始终参与其事，建国前后更直接主持馆务，每一项关键性事务，都得到他的妥善处理，其劳绩尤为卓绝。为纪念这个同人创办的图书馆在这非常时期对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特就十四年中所经历的各项事务，用当时的书简、决议和其它文件编排成文，并加以简要的说明，成为反映“合众”全过程的文献记录。

上海“孤岛”时期创办合众图书馆经过

(一)

最初创议筹建合众图书馆的是叶景葵先生。抗日战争开始时，恰好他为银行业务远赴武汉，而他的寓所在兆丰别墅，邻近战区，寓中存他历年所收藏书，有被毁危险，张元济先生闻讯，每日到叶家代为收拾整理。后来叶先生致函称谢，第一次透露欲将个人藏书创办私人图书馆的意愿：

菊史台鉴：顷接通丈（指陈叔通先生）信，知长者于危险之下为整理故书，感惶无地。葵初购书，皆普通浏览之书。近年稍得先儒稿本及明刻各书，然亦未成片段。以近来物力之艰，得此已觉匪易。今岁室人物故，私计不再购书，并拟将难得之本，一为整比捐入可以共信之图书馆，而于普通各书，则当为随时消遣之用。虽未暇为之，而已有就正有道之意。盖自省鉴别不精，恐以珉珠乱玉也。今于危险时期承长者慨然代为检点，私衷何等庆幸。但敝寓正在炮火之下，敝藏无多，尽可将书箱送至尊寓。因稍为罕见之书皆存入柚木书箱之内，移送不难也。历年虽有草目，但凌乱无伦次。凡无价值而易得者置之可耳。葵到汉尚安适。……草草布谢，敬颂颐福。再侄景葵谨上。廿六、十一、五。

张先生毕生从事于图书的收藏，其酷爱图书是无与伦比的。此次为叶氏收拾、整理其藏书，不单是友情的表现，也是爱护民族文化的具体行动。在战祸扩大、文物图书大量散亡的形势下，如何抢救保存，二老的愿望是一致的。翌年三月，叶生生由汉返沪后给我写的信，更具体地提出筹建图书馆的计划。可能二老对这一计划曾经商讨过的。

半载不通音问，闻燕京照旧开课，则尊居当亦如常。不得近耗，至以为念，博山昆仲亦不知近在何方，故无从探尊处消息也。弟自夏初出京，到家即苦内子患病，沉绵两月，竟至不起。弟因心绪恶劣。陡患失眠，乃至莫干山静养。迄战事起后不能下山，乃于十月间因料理行务至汉皋，一住三月，至一月杪始得返沪。兵燹之余，意态萧索，重忆故人，作书奉讯，尚乞详示近状。茗理（章钰别字）遗物，归君料理，永存燕校，可称得所。所校所著各书，必有增进。嘉业传朴两堂藏书受劫，即近时勇于购置之九峰旧庐闻亦多损失，子遗所存，更可宝贵矣。颇刚近在京否？念念。“禹贡”谅已停版。冥四仍在京否？弟有《读史方舆纪要》山东八册在其弟荡口寓所，已驰函问讯，未得复音。廿七年二月十三日

这是“七七”事变后首次与我的通信。他对章钰（茗理）先生的所遗藏书的安置是很关心的，同时对刘、葛、王三家藏书受劫，为念，九月二十八日来函云：

久不通问，接到四当斋书目一部，体例极善、足以表章式老劬学之里面，吾兄可谓能不负所托矣。

叶先生并言今年本不购书，有书估之旧相识者约略应酬。其时南北藏书家藏书陆续散出，叶先生亦时以所见所得善本见告，并询及燕馆情况：

“燕京图书馆经费尚充足否？吾兄在校是否兼教员，每年收入如何？有契约否？暇乞见示。弟所得之书，将来必为谋永久保存之法，或可以对故友于地下也。”一周后又来函云：

上海方面，如有图书馆组织（私人事业，性质在公益方面。）需要编纂校勘人才，吾兄愿意图南否？每月须有若干金，方可敷用，移家须费用若干？幸斟

酌示我。

信中提到几处藏书楼的“受劫”，亦多损失，“陆续散出”，促使他筹建图书馆的事，从意愿变为行动：“弟所得之书必为谋永久保存之法”。而问我“愿意图南否”，云云，也证明计划在积极进行。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三日来函就明确说要筹建图书馆。

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弟自捐财产十万已足，另募十万已足（此为常年费 动息 不动本）。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惟尚无建筑基金，拟先租屋一所，作筹各处，弟之书籍即捐入馆中。蒋抑庵君书籍亦捐入之。发起人现只张菊生与弟二人，所以不多招徕，因恐名声太大，求事者纷纷无以应之也。惟弟与菊生均垂暮之年，欲得一青年而有志节对于此事有兴趣者任以永久之责，故弟属意于兄，菊生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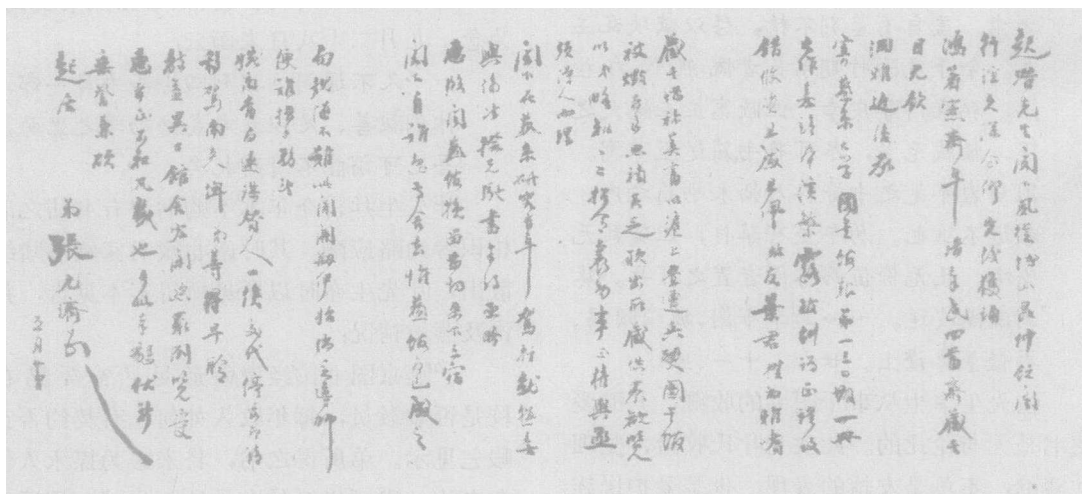
极赞许。今得来示有意南还，可谓天假之缘。”

四月十八日来函云：

奉示知于鄙人所拟图书馆事极荷嘉许，且许他山之助，感如挟纊矣。鄙意组织愈简愈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彼在江苏，声望极隆）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

我接受叶先生相邀，决定南归，但向燕京图书馆辞职时，却复为该馆领导的热情挽留，一时不得脱身，对是张先生来函相促。函云：

起潜先生阁下：夙从博山昆仲饒闻行谊久深企仰。先后获诵鸿著《寒斋年谱》，章氏四当斋书目，尤钦渊雅。近复承寄《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一三〇期一册，大作《嘉靖本演繁露跋》，纠正正谬，攻错攸资。且感且佩！敝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



张元济代合众图书馆近聘顾廷龙信

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

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临，闻燕馆挽留甚切，桑下三宿，阁下自难恕焉舍去。惟燕馆

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变代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得早聆教益。异日馆舍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几也。专此奉恳,伏祈垂察。兼颂起居。张元济顿首。二十八年五月廿五日(手迹见封三)在叶先生坚邀、张先生敦促下,经过“婉商燕馆当局”,我终于离开北平来沪参与“合众”工作。

(二)

我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七日到馆,次日即草拟创办“合众”的意见书。大意如下:

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而日美等国乘其时会,力事搜罗,致数千年固有之文化,坐视其流散,岂不大可惜哉,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

为保存固有文化而办之图书馆,当以专门为范围,集中力量,成效易著。且叶揆初先生首捐之书及蒋抑卮先生拟捐之书,多属于人文科学,故可即从此基础,而建设一专门国学之图书馆,凡新出羽翼国学之图书附属之。至自然科学书籍及西文书籍则均列存,以清眉目。否则各种书籍兼收并蓄,成普通图书馆,卒至汗漫无归。观于目前国内情形,此种图书馆虽甚需要,但在上海区域之中,普通者有东方图书馆,专于近代史料者有鸿英图书馆,专于自然科学者有明复图书馆,专于经济问题者有海关图书馆,至于中学程度所需要参考者有市立图书馆。他地亦各有普通图书馆在焉,本馆自当别树一帜。

当时我的想法要办成一所历史文献的专门图书馆,张叶两先生也是这个意见。意见

书里还提出几个具体问题,如采购范围、分类编目、读者对象、刊印稿本等,都得两先生的同意。只是关于采用四库分类,叶先生提出以下意见:

菊老来函奉阅。编目一遵四库定例,宗旨相同,惟中国文化日渐发展,新出之范围不仅哲学一门,难于归纳。譬如敝藏所有殷虚书契各编,既不能归入小学,又不能归入金石。又如汉晋西陲木简,非金石,又非雕刻。又如安阳发掘报告,及城子崖、魏子窝诸书又不能以地理古迹包括之。又如各种学报,各种季刊周刊之类似非丛书。又如教育学、心理学、美术学之类,亦在国粹范围以内。中国地质地文之类,非地理所能概括。细思问题甚多,望兄详细思之,就所得酌定一目,再与菊老讨论定局为盼。

经菊老考虑后,见复如下:

前日奉手教,并编定四部分目表暨后幅详说,展诵再四。具见虑周藻密,至深钦佩!惟既承垂问,窃愿再进一言。四库总目,疵类诚多,然本馆收藏既以国粹为界,四库奉行已久,且集历代之大成,鄙见既已奉为准衡,则凡四库已收之书,原属之类,似不必加以移改。移改究属少数,或去或留,事有未周,言之亦难成理。至于近出之书,无可比附率合者,则以增析济其穷。原表所增所析,经阁下再三斟酌,自无可议。原稿缴上,即希察入。此为弟泥古偏见。是否可行,仍乞卓裁,并请揆翁核定。廿八年八月三十日。

图书馆工作以图书分类最为重要。由于古籍多属综合性质,完全采用近代学科分类,往往不切实际。我一向赞成南京图书馆采用四库而加以扩充的办法。我馆商讨分类法时,我主张在四库基础上加以增减,既与张先生意见正相吻合,对叶先生注意新出之书

的意见，也得到照应。经过商讨，分类问题遂以确定。

“合众”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开始工作，由创办人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三位先生领导，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成立发起人会。同月由发起人会选聘陈叔通、李拔可两先生为董事，成立董事会。公推陈叔通先生拟订图书馆组织大纲及董事会办事规程。公推陈陶遗先生为董事长，叶景葵先生为常务董事。一九四六年陈陶遗先生逝世，董事长出缺，补选徐森玉先生为董事，改选张元济先生为董事长。一九四九年叶景葵先生逝世，常务董事出缺，补选陈朵如先生为董事，改选徐森玉先生为常务董事。一九四九年五月张先生与陈叔通先生建议扩充董事名额为九人，增选谢仁冰、裴延九、胡惠春、顾廷龙为董事。一九五二年五月谢仁冰、李拔可两先生逝世，补选陈次青、唐弢两先生为董事。

(三)

“合众”以叶先生所捐其全部藏书为基础。叶氏书以抄校本，特别是先儒未刊稿本为特点，而近代考古报告、各种学术论文的学报期刊亦甚珍贵。其次是蒋抑卮先生的藏书，多为印本较早的常用四部书，应有尽有。李拔可先生所捐的藏书大都为近时人的诗文别集。陈叔通先生所捐藏书中有冬暄草堂师友手札及清末新书书刊。叶恭绰先生藏书的珍品有山水寺庙书院等志以及亲朋书札。胡朴安先生所捐藏书多为经学、文字学、佛学书籍以及亲朋手札。顾颉刚先生所捐藏书多为近代史料方面书刊。潘景郑先生所捐藏书是有关清人传记资料及大宗金石拓片，周志辅先生所捐的藏书为几礼居戏曲文献，胡惠春先生所捐为明代刊本及名家校本。

张先生于一九四一年春即以历年收藏旧嘉兴一府前哲遗著四百七十六部一千八百二

十二册赠与本馆，并以海盐先哲遗征三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十五册，又张氏先世著述及刊印评校藏弃之书一百四部八百五十六册，及石墨图卷各一事。先作寄存，冀日后宗祠书楼恢复或海盐有地方图书馆之设，领回移貯。既经倭乱，鉴于祠屋半毁，修复无力，本地图书馆之建设，更属无望。遂改为永远捐助。

(四)

说起来，“合众”在解放前没有办过对外公开阅览，实际上多少年来，它的读者还不至于限于上海一隅，而是遍及全国各地。他们或是来馆阅览，或是通信咨询。就著名学者来说，有地质学家章鸿钊，生物学家秉志，文学家冒广生、郭绍虞、钱钟书、钱南扬，历史学家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李平心、顾颉刚、郑振铎、牟润孙、陈乐素等。亦有各大学学生来馆研究或写论文者，如：冯其庸、沈燮元、王运熙、黄永年、洪廷彦、陈左高、陆萼庭、贺卓君等。还有编写专著的，如：王庸、沈文倬辑校《全五代文》，陆维钊编校《清词钞》，刘厚生撰著《张謇传记》李俨、严敦杰撰著《中国算学史》，胡道静撰著《梦溪笔谈校证》等，均来“合众”搜集资料。还有通信咨询的，如朱启铃、陈钟凡、陈寅恪、陈垣、邓之诚、聂崇岐、王重民、向达等。自遭动乱，资料零落，记忆所及，略述一二如上。

“合众”为读者服务，他们的大作出版，时蒙齿及。刘厚生先生在他《张謇传记》出版时，《后记》中写道：

我在写稿时，所有材料，不能不取资于图书馆。幸有老友叶景葵先生创立的合众图书馆（现在改称为历史文献图书馆）与我住宅距离甚近，因之《张謇传记》的材料，有百分之七十都是向此图书馆搜集。

当时“合众”也给文史工作者一些方便，因年代久远，未能一一记叙，殊为可惜。

有人尝说，“合众”的读者都是专家教授，其实也不尽然。我们对有志于文史研究的青年，不仅乐于接待，也能适当地做一些业务咨询。关于这问题，只要举冯其庸先生的例子，已能说明。

冯其庸先生在他的《蒋鹿潭年谱考略》一文（载《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论文集》）中说：

三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读书，除上课外，剩下的时间，绝大部分是在顾起潜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看书，有时我整天在图书馆，有时是半天在图书馆，当时我就是在撰写《蒋鹿潭年谱初稿》。使我十分感谢的是我时时能得到顾老的指点和关照，我读的书图书馆单给我存置一个书架，每天到后就取书阅读，不浪费一点时间。

冯先生是当代驰名中外的红学家，可是在“三十五年前”，他是一位青年学生。可见我馆的读者虽以专家学者为主要对象，但对有志于学的青年是同样重视的。张先生、叶先生都主张阅览不拘形式，以实效为重，无疑是正确的。

二、建国前后主持馆务

（一）

一九四六年五月第五次董事会临时会议上，张先生当选董事长。自此以后，张先生对图书馆各项事务更加关心，每每与叶先生反复商讨决定。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叶先生以心脏病逝世。午后，张先生与李拔可先生来馆，对我说：“一切事情由我们负责，请放心。”前一日，叶先生正为图书馆经费问题和我商谈，他说：“所存无多，只有用完再说。”他突然病故，更使我惶惶无

措。幸而张、李两先生勇于承担，图书馆方得维持下去。但由于经费日益支绌，不得不向有关方面作将伯之呼，而求援之书，皆为张先生亲笔所写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先生忽病，我闻讯驰往宝隆医院探望，他尚在昏迷之中。正在忧皇之际，忽接浙江兴业银行通知，即日起对图书馆用款停止透支。本来，依照叶先生意见，图书馆会计收支的事，委托浙江兴业银行信托部办理，使我们全力注意本身业务。叶先生既逝，张先生又病，银行方面以为“合众”无力支持，遂不顾文化事业的艰难，作出“停止透支”的决定。后来由陈叔通先生出面担保，继续透支，图书馆才得以维持。

（二）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骚扰地方，屡屡发生强占民居的事，而我馆也曾遭到同样的命运。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国民党军队某部强令将楼顶腾空。徐寄廌、徐森玉先生托人与军事首脑商请勿用文化机关，但无效。晚八时，开来一分队，将大门打开，我们只有通宵守护。十八日张先生闻讯即来坐镇，并与其分队长谈话，嘱其妥慎照料。谈话后对我说：“分队长神色仓皇，语无伦次，可能即去”，夜十一时，果然开拔。五月廿四日又有军队来声称全部征用。我说文化机关，不好占用。军人说现在还讲什么文化？无奈，只可多方推宕使去。五月廿五日上海解放，遂告无恙。

（三）

张先生八十生日，同人谋所以为寿，适张氏藏书目录告成，因发起醵金印行，为“合众”编印藏书目录的第一种。叶先生写了序文略云：“迨书目告成适逢先生八秩诞

展。爰集资以谋印行为本馆刊行书目之嚆矢。本馆编印目录之计划，凡各家专藏别编分目，复合馆中自购受赠之目汇为总目。先生所藏以表章乡贤先世之精神，勤求博访，锲而不舍者数十载，始克臻此，其难能可贵为何如？是目也，可以嘉兴艺文志视之，藉为先生永久纪念。并祝先生眉寿康吉，长为本馆之导师，俾于国家社会文化前途克尽相当之贡献，此不仅同人之私颂也。”

出资姓名：商务印书馆 新华银行 王云五 王志莘 李宣龚 徐寄廌 徐鸿宝 陈敬第 冯耿光 叶景葵 刘培余 潘承弼 蒋复璁 郑振铎 顾廷龙

叶先生序中所提到：先编各家专藏分目，然后汇辑总目，是个好办法。它既能反映全馆所藏，又能查考各家捐献。我们在编辑目录方面，在张先生的关怀和支持下，完成馆藏目录三种，又油印目录八种，其它四五种。张先生曾为这些题签，有的还写了题跋。

(四)

张先生对印书最感兴趣。郑振铎先生曾劝先生编印《四部丛刊》四编。他立即给我一笺：

前日郑振铎兄来言：商务宜续出《四部丛刊》四编，竭力鼓舞，并言当在京中各图书馆各机关代借善本，未知商务人才物力如何？弟自惭精力不给，姑妄筹备，不知尊处藏本中有无可利用之书，既须适合时宜，又须有实用，只可于史子二部中求之。敬祈举示。

先生颇有此意，我以馆务较繁，未敢自告奋勇，为共助手。

我们曾编辑出版《合众图书馆丛书》十五种，曾得到张先生赞许，有的并为题跋题签。所恨没有继续编印，致使若干馆藏稿本，不能为广大读者利用。

张先生编著的《涵芬楼烬余书录》，校印时嘱我相助，在此时期先生几日有便条给我，我亦一二日必往一谈。先生病后，记忆力仍很强，某句某字要查，而且要查原书。这种校勘工作，在“合众”做最为适宜。

先生对于《烬余书录》的出版极为高兴。即赠送陈毅市长一部，陈市长有复谢的亲笔信，赞扬张先生保存古籍之美意，并忆及东方图书馆之损失。张先生再函陈市长，略述他和诸友在“孤岛”时期创建了合众图书馆，不亚于东方图书馆。陈市长来函云：

菊生先生道鉴：惠书及烬余录收阅，甚佩长者保存古籍之美意。今者人民政府明令收集古代文物，设部专司其事。先生之志，继起恢宏，诚可庆也。弟窃东方图书馆之损失，蒋党之罪，与日寇相等，或且过之。开门揖盗，盗寇大至，乌能再善其户牖，当日有人民政府，则盗寇为祸，其烈当不至此。先生以为然乎？弟顷在南京处理军务，他日返沪，当图快晤。辗转细读书末签名，知尊恙日就痊可，可喜可贺。敬谢馈赠。恭候夏安。弟陈毅顿首。六月十三日。张先生致陈市长信：

仲弘市长惠鉴：接奉十三日手书，快如良觌。鄙人保存古籍之微意，辱承奖饰有加，深为感愧。东方图书馆之损失，已不易恢复，惟弟于抗日期间为保存国故发扬民族精神，尝与亡友叶揆初、陈陶遗两君创办合众图书馆，并得陈叔通、李拔可、徐森玉、陈朵如、谢仁冰诸君共襄其事，艰苦经营，忽忽十二年矣。自置基地亩余，建有馆屋卅二方，规模略具，亲友响应，捐购书共达廿二万册。其中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不亚于东方所藏。刊本则明清居多。专藏如陈蓝洲先生师友手札，汪穉卿先生师友手札，嘉兴人著述经小学书籍及近代史料亦复不少。金石拓片约有万种，

欲以文史为范围，供专门之研究。解放后始行公开，各机关学校团体来搜集资料者，均略有所贡献。所藏太平天国由知单仰荷鸿题，曾参加展览会。迨来为面向群众，将原有新文化书籍略加补充，别设普通阅览室以便学习。惟是私人财力有限，经费原甚艰窘，自始迄今，一切简约，成就不多，取是之故，诚愿在原有基础上专力为之，假以岁月，当可继踵东方，忝列于新上海文化建设之一。近承主管机关教育局对敝藏旧书，颇为重视，将有重点补助之意，此惟人民政府乃能兼顾周至，令人感奋。来示所谓东方图书馆之损失，当日有人民政府，则盗寇为祸，其烈当不至此，尤可信也。台端关怀文物，谅荷同情，用敢不嫌烦琐，渎陈清听。倘蒙锡以南针，匡其不逮，曷胜盼幸。附呈敝馆书目三种，敬祈赐察，为荷。专此奉复，祇请勋安，并贺党禧。张元济敬上。

后得市府回信，并由教育局派同志来询问有何困难，有何要求。这是陈市长对“合众”的关怀。

(五)

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就是向著作家提供资料，而资料是包括所有文字记载和实物的。“合众”即本此旨来充实馆藏。这是全馆工作人员一致的看法。下面记述的几件事，即是体现这一思想。

张先生于某年十月十八日来函云：

病榻寻思，来日苦短，因将斋中所存书籍，属女孙为之检理。有杂书若干件扎成一捆，今送上，如觉有用请存，否则弃去可也。又陈宋诒先生批校《汉书评林》、《杜诗详注》各一部，原拟修整，因循不果，今亦无此精力。同时是书本蛀损不堪，如不值修补竟投诸字

麓可耳。又《烟台日报》合订本五册，大约系共党在彼处专出之报”。

先生病中阅书仍甚广泛。榻上放一小几，几上置一放大镜，可以阅报。有一天来信云：

敬启者：解放前蒋介石盘据上海，逮捕各校学生，肆其凶毒，当时有所谓十老人因者致书市长勿助纣为虐。都中友人欲觅求信稿，记兄处曾有存稿，敬求录示一份，感荷不尽。四月廿一日。”

此信有月日而无纪年。回忆往事，补述如下：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此事是由张先生与陈叔通先生发起，集七十以上十老人致函张群、吴国桢等营救被捕学生，信由陈叔通先生起稿，张先生手写。列名者为唐文治、张元济、张乾若、叶揆初、李拔可、陈仲恕、陈叔通、项兰生、胡藻青、钱崇威。十人中为“合众”董事者四人，热诚支持“合众”者三人。信稿当时未经发表，后交“合众”保存。兹录如下：

敬启者：文治等蛰居沪上，不问外事。顾学潮汹涌，愈演愈惨。谁非父母，谁无子弟，心所不忍，实有不能已于言者。学潮有远因有近因。远因至为复杂，姑置不论，近因则不过学校以内问题，亦有因生活高涨，痛至切肤，而推源于内战，此要为尽人所同情。政府内调兵派警，如临大敌，更有非兵非警参杂其间，忽而殴打，忽而逮捕，甚至有公开将逮捕之学生送往中共占领地区之言，此诚为文治等所未解。学生亦人民也；人民犯罪有法庭在，不出于此，而于法外任意处置，是非政府爱民元旨。况中共区域已入战争状态，不知派何人，以何种交通工具送往？外间纷纷传说，以前失踪之人，实已置死地。文治等固未敢轻信。办法离奇，令人骇悸。先将被捕之学生速行释放，由学校自与开导，其呼吁无悖于理者，亦予虚

表采纳，则教育前途幸甚！地方幸甚！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二日

(六)

解放初期，上海要查找历史资料的，多介绍至“合众”。如中央宣传部调用了早期革命书刊，如一九二一年版《列宁全书》第一种《劳农会之建设》，一九二六年版《中国农民运动近况》、一九二七年版刘少奇著《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本组织》等百余种，外交部查找一九四五五年以后中国与欧洲各国订立的协定和条约。市地政局查找租界问题资料，市电影制片厂查阅太平天国史料，市工商局查阅劳工数字资料，华东水产管理局查阅中国渔业问题史料等等。

张先生听说有关方面来寻找资料，均有所得而去，很为高兴。其时馆中经费支绌，收购图书资料，很有困难，因而想起原存东方图书馆之书刊，包括他的日记及信件，移存“合众”，遂致函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当承允诺。原函如下：

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

诸公均鉴：敬启者：本公司东方图书馆即将解散，经董事会议决，全馆图书，除编审部需用者酌留若干外，余均献与中央政府。元济寓中历年积存书报，几于充栋，因于民国二十三年起，陆续赠送该馆收藏，一则冀其可以保存，二则因谋嗜读者之便利。近将曩存送书簿检阅一过，为数殊属不少，然大都为零种散件，自后为便利计，亦有分之于故人叶揆初、陈陶遗诸君续设于长乐路之合众图书馆者，然并无系统的分配，大抵随手掇拾为之，故往往有同属一书，而析置两地者。例如《日本尊经阁藏书库汉籍分类目录》，本编在东方，而索引则在“合众”。又如本馆出版之《东方杂志》，自有全部，且有复

沓，而“合众”则残缺甚多，如能整理配合，均可化无用为有用。又如历史性之刊本，足供稽考，卷册无多者，聚之则为珍罕，散之则属寻常。“合众”弃藏，属于此类者不少概见。如能类聚群分，于阅览尤有效用。按合众图书馆，近亦经董事会议定献之中央，是两馆之图书，均为政府之所有，因“合众”有自建馆屋，同时恳请政府留之上海。元济不揣冒昧，曾将历年致送书报于东方之簿册，邀同“合同”主任顾起潜君会同检阅，将可以移并于“合众”者，分别标识，计共两本，今特送至台阅。如蒙核准，则于彼于此，一转移间，而东方不啻得一替身，而“合众”内容，亦更见充实，且于两馆建设之初意，及元济赠与之目的，均有两全之美。务祈俯赐察核。又有同时寄存元济在馆任职时之日记及各种之信件，亦拟检出恳请发还。以上各节，是否可行？统祈裁核赐复。如蒙允许，当请顾起潜君诣前，听候指挥。临款不胜企禱之至。董事会诸公均此。张元济谨启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

张先生致商务函，系亲笔所作，承以见示，因录存一底，今在故纸中检得。读之深感张先生对“合众”之扶植，无微不至。此亦张先生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怀，无时或释。

张先生领回日记信件等以后，检阅一过，认为无用，将尽弃去。一日，余往省视，入其房门，见满装旧信五、六麻袋。其一袋之面上即为日记卅五册，其它均为信札。张先生对自己旧时给人之信以为不值得保存。翻阅旧时日记及信件亦即以为无用而投之字簏。余取日记翻阅，张先生亦接去翻阅，余言不可弃去，应交图书馆保存。张先生不作声。又取阅各信。余再说你的日记及信件，不交图书馆保存，人家必骂我。先生翻阅傅增湘先生信件后笑说：谈收书，可保

存。从此先生即每日检阅旧信。傅氏信，手加排次。检出汪堯父（荣宝），汤蛰仙（寿潜）、梁任公、熊秉三、黄齐生诸人信陆续送馆。所以给我的信有“今日尚拟来搜落卷否”之语（见《书札》页177）。最后通知我把麻袋中信携馆保存。日记一包于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五日送馆。我曾草复一条

奉示祇悉。文化局复函并昨日会议纪录送呈察阅。附致文化局函亦请审核，为幸。本馆小史，匆匆草就，不识有无谬误为念。文化局接收小组，尚未召开，余容面罄。此致菊丈尊鉴。晚龙上。日记拜收，极为感幸。龙颇拟效法，恐难能精细耳。又及。

（七）

我馆历年各家捐书中或多或少的夹有八股文。叶先生翻阅后，时为我说“其中亦有警句”。我想八股文虽为明清两朝统治者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但既是历史现象，也需要保存一些。闻书友言松江封氏所藏甚多，余即请他去商购，索价奇昂，遂作罢论。解放后，闻入华东文化部文物仓库。旋由文物仓库拨给我馆（原系单片，束置高阁，前年检理一过，草装成册。约存326册），先生闻我言，索取翻阅，对我说：“这批八股文选都是从前的名人名文。”一九五三年为先生中秀才之六十年，旧习有重游泮水之举。先生即按当年考题，重作一篇为戏，陈叔通先生和作一篇以志祝贺。可能还是看了明清八股文选而引起他怀旧之兴。

（八）

后来在张先生、陈叔通先生倡议将“合众”捐献上海市人民政府，经董事会作出决议，并草拟了《捐献书》，经张先生核定。

《捐献书》原文如下：

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捐献书

一、我馆创设虽已有十余年的历

史，也得若干藏书家的热心捐助，但在反动政府时期处处碰到阻碍，以致不易发展。解放后，我政府在英明的毛主席领导之下，逐步走上文化建设的途径，对于民族文化遗产尤搜罗不遗余力，我馆欣逢盛世，思贡献出一分力量，故由董事会议决，捐献上海市人民政府，俾可作有计划的发展。

二、我馆创办的目的，是在搜集各时代、各地方的文献材料，供研究中国及东方历史者的参考。因为历史的范围广大，和它发生关系的学科很多，所以形式不限于图书，凡期刊、报纸、书画、尺牘、拓片、古器、服物、照相、照相底片及书板、纸型等类亦均收存，务使到馆研究者可以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希望现在捐献之后，由贤明的市人民政府督导之下，得在原有基础上，踏实脚步，逐渐发展，使得确成为一个有计划的搜集历史文献的专门图书馆，凡住在上海的或到上海来的世界历史学者都能得到满意的收获。

三、我馆十四年来，因经费竭蹶，人员不多，以致编目工作尚未完成。现在根据不完整的统计，约有图书廿五万册，金石拓片一万五千种，其它尚未约计，希望政府派员会同检点，编造清册，一式两份，可能时再行编印正式目录。

四、各藏家捐赠我馆的图书文物，或为其个人历年所积聚，或为其先世累叶所留遗，均赖其苦心汇萃，蔚为大观。故虽零简断缣，亦为其精神所注，随处见出他的胸中成竹。此若干小系统，我馆得之可以组织成大系统，实为我馆的特色。更加补充，自可神采焕发，显出它的伟大功用。因此，我馆渴望政府，尽量保存此优良传统，不予分散，庶乎各藏家数十百年所兢兢保持的

永远完整。

五、我馆对于赠书各家借阅其自己捐赠的图书时，向来给以一切方便，使他们晓然于我们立馆的本意，凡捐与我馆的比较藏于私家更易于取览，而保管的妥当则远过之，如此，可使藏家益兴起其乐捐之心。这一个办法希望政府继续维持。

六、我馆自有基地一亩九分六厘三毫，除一部分自用外，尚有九分五厘，租给创办人叶景葵建屋，订有租地合同，定为二十五年，应至一九六六年期满，届时所有在租赁地上叶氏自建之房屋概归我馆所有。如期满前租赁关系已存续达十五年以上，馆中必要时可以收回，但须予以贴费。这个合同附在财产文件中。

七、我馆在基地上建有钢筋水泥三层馆屋壹所，现在图书已塞屋充栋，不易再受赠书，阅览室亦日益缩小，更形拥挤。好在旁有余地，捐献之后，政府尚可考虑基本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扩充，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房屋登记后取得收据一纸尚未发给所有权证。

八、我馆工作人员过去经常只有三四人，解放后，业务日繁，逐渐增加至九人，人数不多，而各人对于工作已相当熟练，并都很积极。希望政府继续任用，俾驾轻就熟，更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九、兹为捐献政府编有下列各项目录、名册，祈予点收。

捐献人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

董 事 长 张元济

常务董事 徐森五

公元一九五三年二月

〔按：文化局接管后，人员未动，一九五三年更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一九五七年扩建书库，增加人员公开阅览。编印目录卡片，编辑《明末史料丛书》若干种，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开始编辑《中国丛书综录》。原“合众”董事当时所期望者在科学技术图书馆、报刊图书馆、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馆机构统一前实现。

廷龙附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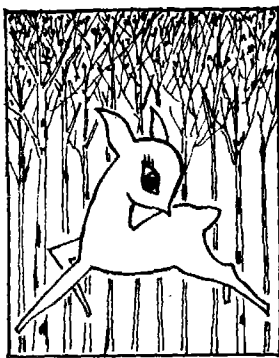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八日为合众图书馆捐献之日，张先生很高兴，清晨给我一缄，表示感谢！

今日为“合众”结束之期。若干年来，弟尤得读书之乐。吾兄十余载之辛勤，不敢忘也。苦心孤诣，支持至今。揆弱有知，亦当铭感！兹有致徐森翁一信，祈阅过转送，为荷。顺颂起潜仁兄晨祉。张元济顿首。六月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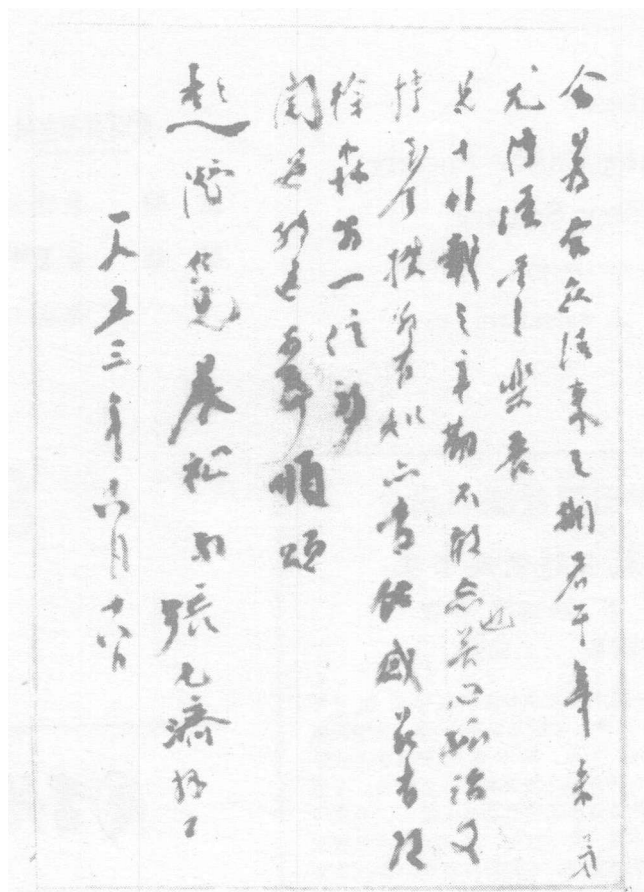
该馆自创始至捐献共十四年，善始善终。记之以供撰写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者参考。

张元济致顿廷龙最后一封信书影（见封三）

（原载《出版史料》第五辑）



张元济致顾廷龙最后一封信书影



《图书馆学通讯》编者附：顾老本文中提及许多人和事，人有用名，有用字、号，也有同一人名字并见的。为便于阅读，现将其中用字、号或名字互见名字列后（不含未署字号者）。限于水平，容有遗漏。

陈汉第、字仲恕

陈敬第、汉第弟、字叔通

顾廷龙、字起潜

李宣龚、字拔可

梁启超、字任公

潘承厚、字温甫，号少卿；又号博山

潘承弼、承厚弟，字良甫，号景郑

钱穆、字宾四

汤寿潜、字蛰仙

汪康年、字穰卿

汪荣宝、字克父

熊希龄、字秉三

叶景葵、字揆初

章钰、字式之，又字茗理，书斋名四当斋

元济、字筱斋，号菊生

传朴堂、浙江平湖葛词蔚藏书楼名。

嘉业堂、浙江湖州南浔刘家堂名，刘承乾

亦以此命名的藏书楼和刻印丛书。

小
启

按 ISSN 编号，本刊连续卷号应为〔总第13卷〕，1987年第1期应为第61期，1957年创刊，刊行4卷30期；1979年复刊迄今。

本刊启

of management system of university library for development also need to be further probed. (page 29)

Academic Review

The appearance in 1985 in this Bulletin the article "Reshaping the Direction of Library Research" has surely aroused a warm enthusiasm in the circle interested in library science theories, and has caused a number of articles and letters sent to this editorial board in discussion of this problem. We realize, however, it is no short time task to reply the question what kind of science is the library science. A comparatively objective demonstration could only be obtained after prerequisite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is said science. This editorial board will be willing to take up the role to afford a field for relaxed study and an environment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men. So, those serious theoretic researchers may go forward from the same starting line to enjoy academic discussion. (page 71)

Mr. Zhang Yuanji and the United Public Library

Mr. Zhang Yuanji (1867—1959) was one of the key founders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n enthusiastic patron of library service, and a man who contributed a great lot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calling attention to old rare Chinese books. In 1939 he cooperated with Mr. Ye Jingkui (1874—1949) and other known figures to establish the United Public Library which took up as its aim the preservation and process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books. Mr. Gu Tinglong (present director of Shanghai Library) was then invited as secretary to plan for the general transactions.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by Mr. Gu Tinglong in reminiscence.

(page 86)